

# 民族走廊、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

——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研究综述

吴俊 马小斐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湖南吉首 418000)

2016年9月10日-11日,由西南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生与吉首大学联合主办的、经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承办的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在吉首大学召开。此次论坛共收到国内众多研究机构与高校学者的共61篇论文,上述论文围绕着中国民族研究中西南方面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方法与应用,民族走廊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民间信仰与仪式变迁,民族走廊与区域生态变迁、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六个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笔者就本次论坛论的基础上,对此次论坛所涉及内容进行的总结与评述。

## 一、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方法与应用

会议中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方法与应用确实成为了讨论热点。有以信仰理论为分析工具,为“什么是民族志”这个社会科学的经典谜题给出自己的解,尝试寻求出路。用案例分析,从科学立场、研究方法、解读及理论解读等方式,以中国文化背景下生产的社会科学普遍理论假说为工具,呈现民族志的本质,在挑战与被挑战中同其他民族的思想并驾齐驱,推动中国学术重返世界思想舞台。<sup>1</sup>有学者策略性地选择食物作为分析与探讨的主题,通过社会的、结构主义的、象征的、唯物主义的、文化的、实践的等视角,就食物选择与食物消费偏好呈现出食物的社会学意义、食物方式的环境因素、在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对立与转换、社会关系的符码、文化理性、阶级品味、甜与权力的社会性建构、整体社会等级和权力关系关联以及食物的行为与意义之间的联系,进行比较深入而详尽地探讨,认为文化概念在解释社会与文化现象时,仍然是最具分析力的工具性概念

---

<sup>1</sup>蔡华:《20世纪社会科学的困惑与出路——与格尔兹〈浓描——迈向文化的解读理论〉的对话》,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论文集,第23页。

之一，但仍需要超越自然与文化的二元论(nature-culture binary)。<sup>2</sup>有学者从工商人类学的视角，在梳理工商人类学学科理论发展百年历程及近年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联系当下我国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所要求的实际成果，理论联系实际提出一些务实的观点、看法、应对措施。对确保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整体实现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会有重大实践意义。<sup>3</sup>还有学者关注到博阿斯学派与历史研究之间具有的“反历史”倾向，对其作为一种特殊的结构视域中的历史观做出新的探索。<sup>4</sup>

在亲属研究方面，有学者认为，相较于西方学者，两岸中国学者的亲属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承袭了西方民族中心主义偏见，同时一定程度内也在观念上存在着汉文化民族主义偏见，从而形成一种二元双重性偏见。作者以台湾泰雅族与云南大理白族亲属研究为例，说明这种二元双重性偏见存在的事实，进而主张，中国人类学的亲属研究，需要诸如大卫·施奈德式的深刻自我反思，来进一步探求不同文化人群的“亲属”。<sup>5</sup>还有以人类学话语中的社会网络与互惠为切入点，经过梳理总结，认为人类学关于维持社会网络运作的讨论基本上围绕着互惠的两个视角展开的。<sup>6</sup>还有学者从“大叙事”、“典范历史”与“民族常识”的反思与再出发，对云南古代“三大族系”理论的检讨，要求必须立足自然地理单元的文化脉络与地方传统的梳理，把材料还原到当地民族与文化大背景之中将有助于推动中国民族研究的深化与发展。<sup>7</sup>

更有新意的一点是，有学者通过对拟亲属关系的研究，以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新华村为例，从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寄名亲家习俗的实践，包括拟亲属关系的建立、维持和实践范围，以及在当代的社会条件下缔结拟亲属关系的功能与意

---

<sup>2</sup>兰林友：《人类学研究的本体论转向——〈写文化〉发表 30 周年的文化反思》，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论文集，第 42 页。

<sup>3</sup> 元光勇：《工商人类学理论在民族地区社会扶贫发展中的应用研究》，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论文集，第 59 页，是作者的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青年项目“十三五”期间民族地区社会扶贫发展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6—GMC—009）、参与的国家民委科研项目“东北朝鲜族地区建成小康社会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4ZYZ007）、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研究”（项目编号：YB2015005）的系列成果之一。

<sup>4</sup>刘海涛：《结构视域中的历史观：博阿斯学派新解》，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论文集，第 72 页。

<sup>5</sup>马腾嶽：《对中国人类学亲属研究的再思考》，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论文集，第 73 页。

<sup>6</sup>张连海：《“乡土中国”遭遇“机器时代”之社会团结：“费孝通问题”与“涂尔干主义”的对垒》，《宁夏社会科学》2015 年第 1 期，第 42 页。

<sup>7</sup>李东红：《坚守还是改变？对云南古代“三大族系”理论的检讨》，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论文集，第 226 页。

义,进而提出拟亲属关系有其独立的文化内涵和特定的文化背景,并不仅是一个依附于亲属关系而存在的亚文化单位,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性和整体性的文化单位。<sup>8</sup>以及有学者从发展人类学的视角,对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中实现共享发展路径进行的探讨很有可取之处,讨论发展人类学对文化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探讨国外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领域里的最新理论与方法在国内旅游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的前景。<sup>9</sup>

## 二、民族走廊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中国西南地区地域广阔,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通过各类民族走廊如“武陵走廊”、“古苗疆走廊”、“藏彝走廊”等相互交往与融合,创造了璀璨的西南地区历史民族文化。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老一辈的民族学家费孝通老先生来到武陵山区视察以后,便在《武陵行》一文中载道:“这个山区在历史巨浪不断冲击下实际上早已不再是个偏僻的世外桃源了,已成为从云贵高原向江汉平原开放的通道。这条多民族接触交流的走廊,一方面由于特殊的地貌还保持了各时期积淀的居民和他们原来的民族特点,另一方面又由于人口流动和融合,成了不同时期入山定居移民的一个民族熔炉。”在费老的笔下,武陵走廊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民族间交往交流的一个通道。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民族走廊的存在与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性。此次论坛众多学者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走廊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内容如下。

有学者研究认为,在中国古代不同民族或族群为了生存的需要,迁徙活动是经常发生的,它们给迁徙民族和相关地区的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西南地区,除藏彝走廊外,还有许多类似的存在。并从“黔蜀走廊”走廊入手,于古籍中找出古代西南地区关于“黔蜀古道”的记载。从“獠人入蜀”、“乌蛮”向泸南的扩张、苗民与羿民的北移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古代“夔国”地区处于多元文化

---

<sup>8</sup>张冰蓉:《当代鹤庆白族的拟亲属关系研究——以新华村“寄名”习俗为例》,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论文集,第488页

<sup>9</sup>陈刚:《发展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生态旅游开发——以云南泸沽湖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09(3)

及交融的局面，揭示了这条通道上的民族迁徙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给古代“爨国”地区的民族社会和民族关系带来的深刻变化；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亦是一个多民族的身份，历史上曾在此涌现过古滇国、乌蛮、南诏、大理等少数民族政权。此次论坛中，学者以“云南省德钦县茨中村”为个案，综合人类学传统上与新近出现的关于仪式的理论，对茨中村的一场葬礼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这场葬礼是茨中村民共同完成的一场“展演”，它超越了民族与宗教的边界，并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人们构建出了属于所有人的村落共同体。并得出茨中村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村落。在这里，无论是民族身份还是宗教信仰，都没有在内部造成明显的区隔，人们在村落层面结为了一个整体；此外。讨论中还有学者以“走廊”与“通道”为论题，认为“走廊”首先作为研究西南中国区域研究的雏形、继之而起的“通道”模式成为西南中国区域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有力地推动了当代西南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亦有相关学者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首先对河湟民族走廊进行了相关的定义，然后从东西农牧区之间的河湟民族走廊、河州历史上的跨民族跨区域的贸易行为、改革开放后河湟民族走廊上的跨民族经济活动、跨民族商业贸易与跨区域流通网络的构建、跨区域的经济活动与跨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对纵向、横向时期的河湟民族走廊的跨民族跨区域的民族经济活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河湟民族走廊上各民族在历史上和市场经济中构建的商贸集散网络，满足了西北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及文化上的需要，促进了农耕和畜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间相互补充，促进了汉藏地区经济交流与发展；跨民族跨区域的经济行为与跨民族跨区域的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与互动息息相关，跨民族跨地域的经济行为不仅促进不同民族和不同区域之间的能量交换和物质交流，同时也促进不同民族和区域之间的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而不同民族和区域间良好的社会交往和文化互动是跨民族区域经济交流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行为不仅满足着不同民族之

间的能量需求和经济发展,而且也是不同民族区域促进社会交往与文化交流,增进多民族相互依存和和谐共生关系的有效方式。

自春秋以降,至魏晋南北朝、直至安史之乱以后的漫长历史岁月中,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中华各族先民之间通过民族走廊等不断融合与交往,最终建构出当下中国民族分布的区域格局,随着我国人类学、民族学本土化发展的趋势,这些曾经在历史时期承担中华各族先民迁徙、交往的民族走廊已经成为当下人类学民族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

### 三、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

我们知道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伴随着近现代民族和国家的形成而产生,在西方的人类学界,关于族群认同理论较有影响的当属根基论和工具论。随着人类学、民族学的传入,关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也随之成为不同时期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所关注的内容。我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而居住在西南地区的民族则占了我国境内民族的半数以上,西南地区各族之间的族群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研究,也成为本次论坛探讨的重点。

此次讨论中,有学者从宏观的层面对我国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提出近年来由于国内外政治、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等的变化与冲击,多种次国家认同逐渐复兴并不断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国家认同的挑战,影响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安全、稳定和发展。因此,增强我国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仍是一个“历史性任务”。对当下我国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整体情状做了分析,就引发国家认同的主要原因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增强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相关路径。最后认为,公民意识、国家认同与民族社会稳定之间有着密切关联,民族地区公民意识状况,实际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情况,更决定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发展;此外,其他学者还从宗教信仰方面进行了独到的研究,其指出在现有国内研究民族对国家认同的成果中,普遍忽略了宗教信仰对一个民族

的国家认同影响。亦缺乏少数民族学者对自身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的成果，造成了该研究领域不足。对于在建国前部分发育程度较低即还没有能力建立国家的少数民族来说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与少数发育程度较高、历史文化厚重的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存在明显差异。并以其长期的研究对象藏族、维吾尔族为例，从目前国内研究国家认同的范式和维度、从“民族”概念差异看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少数民族自身研究本民族国家认同的积极意义、宗教对民族国家认同的影响、关于藏族的国家认同研究、关于维吾尔族的国家认同等上述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究，认为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建国前发育程度低的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取决于这些民族在现实中获得利益的多少；而发育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受制于国家对这些民族的政治权利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合理与否。并最终认为这些民族首先必须成为这个国家利益体（包括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一部分，最终才可能成为这个国家命运体的一部分；青年学这种亦有从民族国家认同出现的一元与多元冲突问题出发，追溯了认同概念的缘起，并从哲学层面进行了辨析，进而梳理了民族国家的发展脉络，及相关学者对于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的分析，再结合欧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探索经验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并不必然导致一元与多元的冲突，可以用具有超越性的同一性来化解，且认同建构不应止步于文化，而应从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整体性推动。可持续发展或许可以提供超越一元与多元的新路径。给当下人类学界、民族学界对于此方面的研究带来一种新颖的视角。总之，此次论坛中关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方面研究的方面还有很多，笔者在此不一一赘述。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二者相互关联。亦是西南地区民族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知道西南地区的众多民族，除了汉藏语系民族、还有苗瑶语系、壮侗语系。可以说民族成分十分复杂，由于各民族都生活在各自的民族文化生境中，各自所衍生出的文化也是不一样的，只有首先在各民族之间形成特定的族群认同后，再于此基础上形成区域的国家认同。鉴于我国生态环境的多

样性、各民族生境的复杂性，西南地区各民族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应该成为人们进一步关注的焦点。

#### 四、民族走廊与区域生态变迁

在中国古代，不同民族或族群为了生存的需要，迁徙活动是经常发生的，它们给迁徙民族和相关地区的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民族走廊与区域研究是人类学的一个基本范式，中国西南的人类学研究有着深厚的区域研究传统，其对单一民族研究的视野局限之克服，以及对西南中国社会人文特质之把握，贡献巨大，也是本次论坛讨论的热点。有在基于“走廊”学说和“通道”研究而展开的“区域模式”，将交互性和流动性作为研究之重点，来深入地阐释形塑西南中国社会人文特质的关系结构，这有利于中国人类学获得更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经验的世界图式。<sup>10</sup>或从食物的视角研究其在族群关系中扮演着联结、区分的重要角色。通过对在马蹄藏族乡藏族与汉族的互动中，透过不断的对话、协商，形成了汉、藏民族饮食习惯趋于一致的现状，探究其中藏汉民族交融的意义。<sup>11</sup>

目前，学术界，区域生态变迁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也成为国际人类学发展的潮流与方向，不仅需要从社会变迁结合地理单元考察，还要求基于扎实的材料梳理分析。讨论中论“狄”的衍化与变迁，<sup>12</sup>狄道的源起，与多民族的融合，其衍变过程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影响深远。在西南地区，除最著名藏彝走廊而外，历史上还存在有许多民族走廊，民族迁徙的规模和持续时间不尽相同。会议中有通过对“黔蜀走廊”的研究，揭示这条通道上的民族迁徙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给古代“夔国”地区的民族社会和民族关系带来的深刻变化。<sup>13</sup>亦或从跨民族跨区域民族经济活动角度来看民族之间和地域之间的经济交流行为，会议中有学者以河湟民族走廊上的临夏回族自治区为例，分析其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出现的跨民族跨区域经济活动，分析跨民族跨区域的经济行为在促进不同民族区域之间能量交换、经济交流、社会交往与文化互动以及相互依存的民族关系方面发挥的功

---

<sup>10</sup>张原：《“走廊”与“通道”：中国西南区域研究的人类学再构思》，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论文集，第139页。

<sup>11</sup>李静、温梦煜：《河西走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人类学研究——探析饮食在马蹄藏族乡藏汉民族交融中的意义》，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论文集，第369页。

<sup>12</sup>徐黎丽：《论“狄”的衍化》，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论文集，第161页

<sup>13</sup>刘复生：《黔蜀走廊与古代“夔国”地区的民族流动》，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论文集，第162页

能和作用。<sup>14</sup>还有根据对中国西南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硃碛藏族乡的田野调查资料，以家屋的名号“房名”的研究为切入点，讨论嘉绒藏族的社会结构。<sup>15</sup>

## 五、民间信仰与仪式变迁

凡民间宗教习俗现象包含基本的两个范畴：信仰与仪式，这期间是思想和行为的差别。据涂尔干所言，仪式本身又可分为积极仪式和消极仪式两类，前者以各种仪式膜拜为内容，后者是各种宗教仪式禁忌。<sup>16</sup>而信仰、仪式和象征三大体系在其中有不可分割的重要意义。我们将此次讨论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本次讨论中有以民间信仰作为理解中国地域社会的切入点，就湘西土王祭祀空间的变迁进行研究，以湘西田家洞村的舍巴节为个案，梳理土司时代以来土王祭祀空间的演变及其与地域社会的关系，展现出明清以来湘西社会在国家力量渗透之下历史发展脉络下的独特图景。<sup>17</sup>有以基督教在该区域傜族、怒族区域内的传播、发展历程的系统梳理与田野调查，探讨中缅边境跨境民族地区基督教的“本土化”与信仰主体的“基督教化”相辅相成的演变特征。<sup>18</sup>而其背后就是基督教本身与信仰主体同时进行适应性变迁的生存智慧。<sup>19</sup>

有以耶律大石带领的契丹族群“以少治多”，在中亚和西域地区的实践为基石引入中亚地区的佛教和儒家文明的价值观与治理模式，形成汉地文化与契丹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为蒙元帝国时代亚欧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sup>20</sup>有以藏学概念界定为起点，进行学科层面上的探讨，为进一步建构藏学学科理论提供参考与借鉴。<sup>21</sup>还有学者着眼于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贸易与人工营林业形成与发展，以二者为契合点，发现祠堂文化已经成为清水江地方文化的标识。

---

<sup>14</sup>王平：《河湟民族走廊上跨民族跨区域的民族经济活动——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论文集，第424页

<sup>15</sup>李锦：《房名与嘉绒藏族社会结构》，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论文集，第198页。

<sup>16</sup>应萍儿：《仪式变迁与日常生计：信仰与利益之争》，华东师范大学，2012

<sup>17</sup>李凌霄：《从旗到家族：湘西土司王祭祀空间而变迁研究》，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论文集，第307页。

<sup>18</sup>高志英：《云南K县上帕镇傜族、怒族基督教状况》，（美国）北美基督教学会主编：《基督教与中国》，（The Blessing Foundation, U.S.A.），2007年。

<sup>19</sup>黄剑波：《地方文化与信仰共同体的生成与中国基督教研究》[M]，知识出版社，2013。

<sup>20</sup>李进新《丝绸之路宗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184

<sup>21</sup>万果《藏学学科再思考》，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论文集，第86页。



探讨祠堂文化的规约下如何实现林地产权稳定,怎样维护该区域人工营林业的发展,使得清水江下游社会祠堂文化在地方有序化历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进而推进了地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探求祠堂文化家族长的权威与国家地方治理的契合方式。<sup>22</sup>

在探究家族与家族的制衡关系所呈现出的地方社会建构张力时,从家族之间“结盟”的“拟血缘化”聚落家族对地方社会的“有序化”视角出发,对传统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特定价值与意义的角度去反思。<sup>23</sup>亦有从社会网中的禄劝彝族丧葬仪式进行研究,这一仪式过程整合彝区社会,促进人们交往互动的社会功能,为积累社会资本、建构社会网络提供了场域,价值多元。<sup>24</sup>还有学者以边界的超越与共同体的呈现为题,综合人类学传统上与新近出现的关于仪式的理论,对云南省德钦县茨中村,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村落的一场葬礼进行了分析,进一步对现代社会中仪式的价值及其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仪式也应当在新的时空情境下被赋予新的内涵。<sup>25</sup>

## 六、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

文化,是指导人类生存发展延续下去的人为信息体系。文化,可以说每一个民族都有,但是各民族的文化事实体系则不一样。我国西南地区,由于各民族的历史遭遇不同、历史进程不同,各民族所处的生境亦不同,所以其建构出来的文化实施体系也会呈现出系统性差异。随着文化遗产的逐渐产业化,如何运用西南地区历史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助推当下区域经济的发展,亦成为西南地区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学者关注的热点。此次论坛中,亦有众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学术视角有针对性的对西

---

<sup>22</sup>罗康隆、麻春霞:《清水江下游祠堂文化与地方社会秩序》,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论文集,第290页

<sup>23</sup>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1958年)、《中国的宗族和社会:福建与广东》(1966年)  
罗康隆 麻春霞《第九届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论文集<清水江下游的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的建构>》299页。

<sup>24</sup>叶宏、邓涛《社会网中的禄劝彝族丧葬仪式》,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论文集,第208页。

<sup>25</sup>刘琪、胡梦茵:《边界的超越与共同体的呈现——对云南省德钦县茨中村一场葬礼的人类学解读》,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论文集,第359页。

南民族地区的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进行了研究。

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学者从工商人类学的视角出发，首先梳理工商人类学学科理论发展百年历程，并联系当下我国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所要求的实际成果。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研究，然后以工商人类学家指导云南傣族社会扶贫发展的经验案例具体分析，论述了当地政府与企业傣族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具体进行精准扶贫的策略。并为我国当下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倡导以工商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指导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此外，还有学者以西南民族地区具体的优秀文化遗产保靖黄金茶为案例。保靖黄金茶因为历史悠久，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和优秀的文化传统，可望成为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的候选对象，加之保靖黄金茶虽然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链，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相关茶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也令人堪忧。为此，展开试探性的田野调查。而后从黄金茶的历史回顾、黄金茶产区的人文地理状况、对技术的解读、生产现状等方面进行了阐述。最后得出保靖黄金茶能否有利申报国家优秀文化农业遗产以及不理的条件。可以说针对于黄金茶这一湘西民族间的优秀农业文化遗产的发展与建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外，其他的学者西南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助力区域经济发展以及西南地区历史时期遗存下来的优秀本土农业文化遗产等对于精准扶贫、生态扶贫所带来的启示等作了较为细致的研究。

总之，任何一个领域或者文化遗产，需要成为一个稳定的文化产业来助推区域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们付出的努力还有太多。每一个时代的学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使命，处于当今时代的西南民族地区的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唯有立足于田野，坚持走进田野，方能进一步助推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发展。

